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李政军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社会学家认为,只要集团存在有共同利益,它的成员就会共同努力去实现这种利益;经济学家却认为,共同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它的非排他性将引发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奥尔森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都犯有相同的错误,即它们都没有去研究集团规模、成员结构和制度安排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奥尔森在一系列条件下开创性地分析了影响集体行动的因素,构建了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关键词:核心理性;公共物品;搭便车;集团;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0)04-0022-07 **收稿日期:**2010-04-20

作者简介:李政军(1963—),重庆江津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一、引言

1998年2月19日下午3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在他离开办公室的路上。两个星期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讣告,以奥尔森的两部学术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的思想为主线,介绍他的治学风格和研究历程。对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经济学家》杂志评价说:“这本书已经被看成是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如果他活着,完全有可能凭借其集体行动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为了表明《经济学家》杂志的评价不只是对生者的安慰,本文接下来将用一系列论据证明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力。

首先,作为奥尔森向哈佛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巨匠的指点。奥尔森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爱德华·张伯伦,他是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1962年张伯伦因病退休,1963年奥尔森将他的博士论文草稿交给作为顾问的托马斯·谢

林,谢林将写有自己大量评论的草稿退还给奥尔森。在看了这些评论以后,奥尔森感到非常着急,甚至都没有信心完成自己原定的题目,并打算另选博士论文题目。由此可见谢林的修改意见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具有重大的影响^{[2]260}。在该书1971年版序中,奥尔森把“那些提供批评建议和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分成5类,共33人。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在这33人中,有14人被收入马克·布劳格和保罗·斯特奇斯主编的《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有6人被收入马克·布劳格撰写的《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有2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4人获得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或“贝茨·克拉克奖”,有7人担任过的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或副会长,而对奥尔森“帮助最大的人”——谢林,1987年获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1991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次,《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后续著作《国家的兴衰》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推崇,并为奥尔森赢得多个重量级的学术荣誉。与科斯《企业的性质》遭遇一样,《集体行动的逻辑》也“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成功之作”^[3]。倒是作为“《集体行动的

逻辑》的续篇,并且大部分内容是对该书论断的运用^{[4]18-19}的《国家的兴衰》1982年出版后,1983年就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格拉迪斯·M·卡默雷尔奖”。奥尔森也因此于1985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会员,1986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之前奥尔森曾担任过南部经济协会主席,公共选择学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主席)^{[2]257}。到2007年,《国家的兴衰》被引证1800多次,在经济史类著作中,其被引证次数仅低于排在第一位的阿弗雷德·钱德勒著的《看不见的手》^[5]。至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直到1995年才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利昂·D·爱泼斯坦奖”^{[2]260}。

最后,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一书,概述了100多年来美国政治科学各子学科及其总体的发展,该书各章参考文献共涉及1630名作者撰写的3403本政治学著作,其中最常被引用的4本著作依次是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曼瑟·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和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6]。其中,诺斯和奥斯特罗姆分别于1993年和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奥尔森还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集体行动”和“官僚制度”两个辞条的撰写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这两个领域的贡献。因为该辞典编辑遴选辞条撰写人的标准是“他们的学术专长堪称当今经济学各个分支和各种观点的代表”^[7]。

综上所述,我们也难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奥尔森教授是无人能够替代的,他对经济科学发展无可估量的贡献还有待我们加以正确的评价”^[8]。因此,本文将主要结合奥尔森的著作,对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进行全面的述评。

二、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

如果说理论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9],那么概念就是这个系统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因此,理解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首先应该从理解它的五个基本概念开始。

1. 私利、自我利益或自利的(self-interest)

无论是在《集体行动的逻辑》,还是在《国家

的兴衰》中,奥尔森都宣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本书中使用的分析工具来源于经济理论”^{[10]4}。作为经济学家的奥尔森,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埃奇沃斯的回答是“经济学的首要原理就是每一个行动者都只受私利所驱使”^[11]。为了表明自己对这一“首要原理”的坚持,奥尔森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著名论述来进行论证:“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个人为了其理想的或物质的利益而进行并完成的。当经济活动是根据集团的秩序方式而调整时,这也自然是正确的……即使一个经济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利益的结构和相关的情况会有所改变;会有其他追求利益的手段,但这一根本的因素仍将与以前一样。当然确实存在只建筑在单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但更为肯定的是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而且从经验可以归纳出他们不能也永远不会这么做……在市场经济中使收入最大化无疑是所有经济行为的动力”^{[10]46}。

正是从个人行为动机的自利性假定出发,奥尔森才对传统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提出质疑,指出“认为从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10]2}。并且,即使“存在着由利他或无理性的个人组成的集团有时会从他们的共同利益或集团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逻辑可能性,尽管这多少有些荒谬。但是,如后所述,本书的经验部分会试图表明,这一逻辑可能性一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0]3}。

2. 理性的(rational)

除了假定个体行为动机是自利外,奥尔森还假定个体行为是理性的。“核心理性(core rationality)一般假设一个人具有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的偏好。这导致了一致性的行为,即意愿的目标……经济理性包括核心理性和两个激励性的假设:个人行为是物质驱动的并且人们是利己的。物质驱动的行为意味着一个人的行动由获取物质的愿望所支配,即个人偏好的强弱是物品本身的价值,而不是获取它们的过程。利己意味着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主要的动机。”^[12]

由于奥尔森把自利性动机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因此他使用的理性概念就是核心理性。这一点从他关于理性与自利关系的讨论就可以得到说

明。奥尔森认为：“理性(rational)未必意味着自利(self-interested)。本书的观点甚至当存在利他行为时也正确……首先考虑一下对于可观察后果和结果的利他态度——假设某个个体出于利他考虑愿意牺牲某些闲暇和个人消费来满足某些数量的集体物品,这种利他考虑使其他人也会得到这种集体物品……这种利他主义的消费并非意味着不理性,也并非意味着个人做出的决策与个人拥有的价值或偏好最大化满足不一致。利他主义并不会对任何一组物品通常的边际替代率递减提出疑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像更多的任何物品(自利或利他)可以获得一样,为获得更多递减的物品,必须放弃更多的其他物品(自利或利他)。”^{[4]33}

3. 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public goods)

经济学家通常从两个维度去定义物品的性质:一个是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或称供给的可分性与相联性(jointness of supply);另一个是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笔者认为,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要强调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而不重视该物品是否具有非排他性^[13]。但奥尔森主要强调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不重视非竞争性。为了证明这一判断,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奥尔森的公共物品定义。“定义一个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 $X_1, \dots, X_i, \dots, X_n$ 中任何个人 X_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换句话说,那些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而对于非集团物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10]13}。显然,奥尔森的定义“强调了排除集体物品潜在消费者的不可行是其最大特点”,而“相联性并不是公共物品的一个必备的属性”^{[10]47}。不过,奥尔森“在这里研究的大多数集体物品确实都表现出了适度的相联性”^{[10]48},即纯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名称容易导致一个误解,即以为它只与物质产品有关。但是,“实现了任一公共目标或满足了任一公共利益就意味着已经向那一集团提供了一件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一个目标或意图对一个集团来说是公共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个集团中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利益和满足之外”^{[10]13}。因此,公共物品也可以被译成共同利益或集体利益。另外,公共

物品未必带来正效用,给消费者或生产者带负效用的公共物品被称为公害品(public bad)。

4. 集团(group)

集团的一般含义为“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14]。但在奥尔森的著作中,集团概念未必有任何组织(organization)或制度(institution)的含义。奥尔森认为,只要是存在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就叫做集团。因此,在分析集团行动时,他把有组织的国家、工会、政党和利益集团与无组织的消费者、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都叫做集团,它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被动员起来的潜在集团”与“潜在集团”的差别^{[10]42}。

5. 搭便车(free-rider)

该词出自美国西部的一个掌故^[15]。早年道奇城盗马贼横行,牧场主们就组织起来保护牧场,每个牧场主都为这种自发的保安力量贡献一定的人财物力。但不久有一些牧场主开始撤出这种组织,因为他们发现,只要这种自发的保安力量依然存在,自己撤出后就可以免费享有它带来的好处,这些人被称为“自由骑手”(free-rider)。但没过多久,由于人人都企图通过自己的撤出占集体的便宜,保安力量也就不复存在,盗马贼又猖獗起来。后来,经济学家就借用这个词来表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小于其获益的人或行为,并与时俱进地将它称为“搭便车”。

三、集体行动理论的模型

奥尔森坚信“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具有累积性特征”^{[4]186}。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与其他什么理论有关?奥尔森的回答是“集体行动理论实际上普遍被认为是关于市场运行失败的理论;它体现了公共财货及外在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17]518},即公共物品及外在性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将引发自利、理性的消费者或生产者的搭便车行为,使它们不能通过市场(私人自愿)行为实现有效供给。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我们假设某集团有消费者1和2,他们从公共物品 X 的消费中获得的边际效用分别是 D_1 和 D_2 ,整个集团的总边际效用 $D = D_1 + D_2$ 。假设公共物品生产的边际成本是 MC ,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萨缪尔森条件是 $D = MC$,数量是 X_g ,见图1。但是,公共物品私人自愿

供给的条件是 $D_2 = MC$, 数量是 X_s 。因为, 消费者 1 从公共物品得到的边际效用始终低于它的边际成本, 他没有激励提供公共物品。更重要的是, 消费者 2 提供 X_s 数量的公共物品, 使消费者 1 可以免费获得斜线 D_1 下面与垂线 AX_s 左边的面积表示的消费者剩余, 这将激发他的搭便车行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量小于有效供给量, 出现了三角形 ABC 面积表示的无谓损失。

奥尔森认为, 传统公共物品理论只研究了公共物品的性质, 尤其是非排他性导致的搭便车与私人供给的低效率, 它没有考察公共物品所涉及的人数(集团规模)、偏好程度(成员构成)和制度安排对有效供给的影响。奥尔森正是通过对不同规模、不同偏好程度和制度安排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中个人最优化逻辑的清晰分析, 形成了一种关于集体行动的十分不同的观点”^{[17]516}。下面, 我们就考察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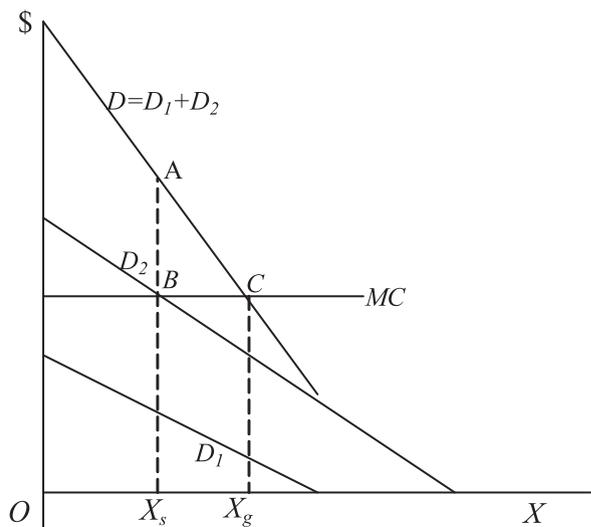


图 1 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集体行动理论模型“是以初始的一套假定为基础所产生的理论陈述”^[18], 因此, 清楚地说明模型的初始假定, 是正确理解它所提供的理论陈述的出发点。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内容, 可以把它的初始假定总结为三个。

1. 集体物品的“总成本函数会上升, 因为集体物品肯定和非集体物品一样, 取得越多, 总成本越高……简而言之, 成本(C)是获得集体物品的比率或水平(T)的一个函数 $C = f(T)$, 平均成本曲线为传统的型”^{[10]19}。

2. 从公共物品获得的“集团总收益取决于获

得集团物品的比率或水平(T), 以及集团的‘规模’(S_g)”^{[10]20}。用公式表示为 $V_g = S_g T$ 。

3. 集团中个人 i 从公共物品获得收益 V_i 同样取决于“个体成员的‘规模’ S_i , 即他从一定水平的集体物品供给中的获益程度”^{[10]25} 与公共物品的数量。用公式表示为 $V_i = S_i T$ 。

根据公共物品的集团收益与个人收益函数, 可以得到:

$$V_g = \sum_{i=1}^n V_i = \sum_{i=1}^n S_i T = T \sum_{i=1}^n S_i = S_g T, \quad \sum_{i=1}^n F_i = 1 \quad (1)$$

其中, $F_i = V_i / V_g$, 是成员个人获得的收益占集团收益的份额。成员个人 i 从公共物品获得收益 V_i 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V_i = F_i S_g T = F_i V_g \quad (2)$$

根据公共物品的集团收益与个人收益函数可知, 它们都是线性函数, 与公共物品的数量无关。该假定说明奥尔森这里涉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

在对公共物品的成本函数与收益函数进行说明后, 奥尔森转向讨论公共物品集团提供的萨缪尔森条件与私人提供的均衡条件。首先, “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集团如果得到了一定量的集体物品, 其数量达到最优的条件为: 集团收益和集体物品成本以相同的速率增加, 即 $\frac{dV_g}{dT} = \frac{dC}{dT}$ ”^{[10]24}。该条件也被称为公共物品集团提供的萨缪尔森条件。

对于公共物品个人自愿提供的条件, 奥尔森认为, “一个集团做什么取决于集团中的个人做什么, 而个人做什么又取决于他们采取其行为的相对好处。任一个人 i 得到任一数量的集体或集团物品而获得的好处 A_i 等于个人收益 V_i 减去成本 C ”^{[10]20}。用公式表示为:

$$A_i = V_i - C \quad (3)$$

私人提供集体物品的均衡或最优条件是(3)式的一阶导数等于零, 即:

$$\frac{dA_i}{dT} = \frac{dV_i}{dT} - \frac{dC}{dT} = 0 \quad (4)$$

将(2)式代入(4)式, 就可以得到:

$$F_i \frac{dV_g}{dT} = \frac{dC}{dT}, \quad \text{或者}, \quad \frac{dV_g/dT}{dC/dT} = \frac{1}{F_i} \quad (5)$$

(5)式说明, “当集团收益率乘以个人得到的集团收益的份额等于总成本的增加率时, 个人得

到的集体物品数量最优。换句话说,集团收益率 $\frac{dV_g}{dT}$ 必须超过成本增加率 $\frac{dC}{dT}$, 其倍数等于集团收

益超过个人收益的倍数,即 $\frac{1}{F_i} = \frac{V_g}{V_i}$ [10]21。

四、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命题

奥尔森通过将公共物品集团提供的萨缪尔森条件与私人自愿提供的均衡条件进行比较,并重点讨论均衡条件的决定因素,得出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命题是:“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10]2。该命题可以分解成三个子命题。

1.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10]42 具体地讲,第一,“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10]2。这被称为大型(潜在)集团理论,它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中心思想” [10]191。第二,“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 [10]42。这被称为小集团理论,它只是潜在集团理论的逆命题。因此,只要说明潜在集团理论,也就说明了小集团理论。

为了说明潜在集团理论,我们有必要讨论(5)式中 F_i 的决定因素。将个人收益函数和(1)式代入 F_i 的定义式,可以得到:

$$F_i = \frac{V_i}{\sum_{i=1}^n V_i} = \frac{S_i T}{\sum_{i=1}^n S_i T} = \frac{S_i}{\sum_{i=1}^n S_i} \quad (6)$$

(6)式说明,影响 F_i 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个体成员的规模或获益程度 S_i ,另一个是集团规模或人数 n 。在 S_i 相同的情况下, $F_i = \frac{1}{n}$, (5)式

转变成 $\frac{1}{n} \times \frac{dV_g}{dT} = \frac{dC}{dT}$, 表明集团的规模越大, S_i 就越小,个人从自己提供的公共物品得到的获益 $\frac{1}{n} \times \frac{dV_g}{dT}$ 就越少,因此对公共物品的贡献 $\frac{dC}{dT}$ 就越

少。一种极端情况是 n 趋于无穷大,个人从自己提供的公共物品得到的获益趋于零,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趋于零,导致集体行动完全不存在。

对于潜在集团不能展开集体行动,奥尔森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解释:第一,集团规模越大, S_i 越小,自利的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激励就越小。这是(6)式所包含的内容。第二,集团规模越大,个人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越小。因此,“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成员完全不顾自己的利益,他也不会理性地为提供集体或公共物品作贡献,因为他的贡献是无足轻重的。一个把别的农民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上的农民不一定会限制自己的产量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因为他知道他的牺牲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多大的好处。这样一个理性的农民,不管有多么无私,也不会作出这种徒劳无益的牺牲……不能带来明显效应的无私行为有时候甚至被认为是不值得称赞的。一个想用一只铅桶来挡住洪水的人甚至会被那些试图帮助他的人认为是一个怪人而不是一个圣人” [10]73。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 [10]40。第四,“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有在较小的集团中才起作用。这些集团很小,成员间有着面对面的接触……社会激励不会去引导潜在集团的成员去获取一件集体物品” [10]72。

2. 命题1“只考虑集团中个体或单位的数目是不够的,因为集团任何成员的 F_i 不仅取决于集团中个体成员的数量,还取决于个体成员的‘规模’ S_i ,即他从一定水平的集体物品供给中的获益程度” [10]25。具体而言,第一,“一个由 S_i 不等因而 F_i 也不等的成员组成的集团,其偏离最优水平的倾向要小于相同大小的集团组成的类似的集团(而且也更有可能是为自己提供一定数量的集体物品)”。第二,“由于没有人受到激励提供更多的集体物品,一旦具有最大 F_i 值的成员获得了他想要的数量后,在一个小集团中对提供公共物品的负担进行的分配与集体物品带来的利益也不成比例。具有最大 F_i 值的成员会不成比例地承担成本。对于具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 [10]25。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我们假设一个集团只有两个人,其中成员1的 $F_1 = 0.2$,成员2的 $F_2 = 0.8$ 。成员2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

成员1,因此他比成员1更有激励提供公共物品,其均衡量接近公共物品最优提供量的80%。相反,由于成员1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收益比成员2低,而且他所需要的最优数量比成员2少,成员2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完全能满足成员1的需求,所以成员1将选择搭便车行为,即出现“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图1直观地说明了成员在偏好、禀赋等因素上的不对称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3. “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一个或者是通过集团中的个人进行强制、或者是对那些个人进行积极的奖励,使之被引向为其集团利益而行动的潜在集团,这里称之为‘被动员起来的’潜在集团。这样,大集团被称为‘潜在’集团,因为它们没有采取行动的潜在的力量或能力,但这一潜在的力量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能实现或‘被动员起来’。”^{[10]42}因此,该命题被叫做“被动员起来的集团理论”。

根据命题1知道,仅仅有共同利益的潜在集团是不会采取集体行动的。因为,集体行动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所以,必须有不同于集体利益的选择性激励。“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这些‘选择性的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10]41-42}所以,被动员起来的集团是选择性激励的副产品。

五、对集体行动理论的简要评价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对社会学中的传统集团理论、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与外在性理论“提出了疑问”,并促使学者们研究“在集团的大小和其凝聚力、有效性、对潜在成员吸引力之间是否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以及一个集团的大小和它对个人为集团目标出力的激励之间是否有着联系”^{[10]17-18}。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奥尔森开创性地研究了集团规模、集团构成和制度安排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他的研究直接诱发了拉塞尔·哈丁、托德·桑德勒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等人的研究^[19-21]。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奥尔森开创的集体行动理论的肯定。因为,奥斯特罗姆获奖著作的副标题就是“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当然,作为集体行动理论的开创性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基本概念、基本模型和推论方面,都显得有些粗糙,甚至存在有逻辑上的矛盾和错误。具体表现在:第一,在集团概念的使用上,奥尔森将有组织的正式集团(如国家、工会和专业性团体)与没有正式组织的完全竞争企业、消费者和失业者群体等混为一谈。选择性激励虽然是理解被动员起来的集团的关键性概念,并且奥尔森也意识到它所包含的“一些特殊的制度”^{[10]74}含义,但他并没有去深入探索这些含义。第二,在基本模型方面,奥尔森只讨论了纯公共物品的情况,但他却将由此得到的结论推广到了公共池塘物品。另外,奥尔森虽然宣称“因为本书的重点是大集团,所以在此就忽略了小集团行为的许多复杂性”^{[10]30}。但是,他还是把“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10]42}作为其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第三,在研究逻辑方面,《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组织进行系统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它们的目的”^{[10]5},即公共利益。但奥尔森研究得到的“中心思想”是公共利益不构成集体行动的充要条件,相反,它只是选择性激励的副产品。换句话说,公共利益并不是组织或集团研究的逻辑起点。这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

参考文献:

- [1] Anon. Mancur Olson[J]. The Economist, 1998(3): 107.
- [2] McGuire C M. Mancure Lloyd Olson, JR. 1932—1998: personal recollections[J].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98, 24:253—263.
- [3] 科斯 H R. 企业、市场与法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200.
- [4] 奥尔森 L M. 国家的兴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5] Heckelman C J. Explaining the ra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after 25 years[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7, 74(1): 18.
- [6] 毛寿龙. 中文版译序[M]//奥斯特罗姆 E.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27.

- [7]伊特韦尔 J, 米尔盖特 M, 纽曼 P.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出版说明[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1.
- [8]奥尔森 L M.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 有的国家富[M]//吴敬琏. 比较: 第七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38.
- [9]林定夷. 科学理论的结构[J]. 哲学研究, 1999(6): 72.
- [10]奥尔森 L M.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11]哈里斯 H. 科学与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3.
- [12]斯考森 M, 泰勒 K. 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引言.
- [13]李政军. 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性质及其逻辑蕴涵[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5): 45 - 51.
- [14]现代汉语词典[M].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593.
- [15]樊纲. 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56.
- [17]奥尔森 L M. 集体行动[M]//伊特韦尔 J, 米尔盖特 M, 纽曼 P.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一卷.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518.
- [18]琼斯 G H.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0.
- [19]Hardin R. Collective action[M]. Baltimore: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Inc, 1982.
- [20]Sandler T. Collective action[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 [21]奥斯特罗姆 E.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责任编辑: 杨凤春)

On Olson's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LI Zheng-jun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Soc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hold totally different opinions regarding collective action. Sociologists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there are common interests in a group,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will together strive to achieve such interests; however, economists argue that since common interests are a kind of public goods, their non-exclusive property will give rise to group members' free-rider behaviour, thus 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Olson holds that the two kinds of different opinions have made the same mistake, namely, neither of them studies the influence the scale of the group, the structure of the member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have on collective action. Olson pioneers in analyzing the factors effecting collective action under a series of conditions, which construct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Key words: core rationality; public goods; free-rider; group; collective action